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新时期小说中"苦难"的救赎路径

张 锦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苦难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很多作家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也对苦难的救赎之路进行了探索。新时期小说对于"苦难"主要叙述了三种救赎路径:一是为活着而活着的忍耐态度,二是逃离到宗教中去寻找解脱和超越,三是悲剧英雄式的反抗方式。

关键词:新时期小说;苦难;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2-0103-06

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苦难,如疾病、贫穷、受辱乃至死亡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正是在与苦难相抗争的过程中社会得以不断进步。世界上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对于苦难的诉说;那些最优秀的作家一般也都是关注人类苦难的作家。苦难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不仅仅是指苦难在很多时候构建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和思想内蕴,同时也意味着创作主体自身的苦难经历经常会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沉淀于作品中,而且,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关于苦难的创作理论。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古往今来很多作家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也对苦难的救赎之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如众所周知的加缪、福克纳、海明威等人,他们的笔下都出现了大量而纷繁的苦难,面对苦难,他们共同选择了在苦难的废墟上将人重新建立起来以实现对于苦难的超越:加缪靠的是西绪弗斯式的蔑视惩罚与神明的反抗精神,福克纳靠的是"人是不可摧毁的"忍耐能力,海明威靠的则是"老人"那种打不败的斗争精神。那么新时期小说又是如何实现对于"苦难"的救赎的呢?

一、忍耐:为活着而活着

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对苦难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在这些人眼里,人生只是一场永远无法清醒的梦。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也找不到与苦难对抗的力量之源,再沉重的痛苦和灾难也唤不起他们一丝半点反抗的勇气和魄力。他们是懦弱的,无力的,只能一次次地在苦难中绝望、麻木、呻吟和心碎。这些人活着的目的就是活着。

余华全力书写生存的苦难,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种化解苦难的方式。如许三观是以卖血的方式承受苦难的袭击。自从学会了卖血,每次遇到困难,他都靠卖血挺过去,从未去想除此之外还有无更好方法。数九隆冬,许三观浑身颤抖地走在卖血的路上。多次卖血使许三观的身体逐渐衰弱,几乎丧命。这种对苦难的忍耐态度令人心惊胆战。《活着》中福贵的人生观里找不到"理想"和"抗争"的字眼,也是一位顺从命运者。他的苦难来源于亲人们的相继死亡。但福贵并没有因此而拒绝生存或奋起抗争。当老人福贵和他的老黄牛在古老的土地上劳作、"对话"并且伴着福贵苍老粗哑的歌谣时,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福贵平和的心境。余华揭示了人不可抗拒的宿命和对待

收稿日期:2006-02-24

作者简介:张 锦(1979-),女,辽宁黑山人,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苦难的忍耐态度。这种生存态度是以对人的自我创造能力和自我拯救能力的否定为前提的。

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讲述了一个家庭在短短的时间里由完整而变得支离破碎的过程，也充满了纷纷扰扰的苦难。主人公陈村可以说是另一个福贵老汉，懦弱而胆小怕事，在重重的灾难与不如意面前并未作丝毫的抗争，在重大的打击下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得知儿子晓雷杀人之后竟再也不堪承受巨大的压力倒在一条曾经在过去的岁月里流水湍急波涛汹涌的河床上，再也没有起来。福贵和陈村们的苦难在叙述者平静如水的叙述下变得分外鲜明，刺痛了我们久已习惯于庸常的眼睛。仔细想想，持这种灰色人生价值取向的人物在新时期小说中为数不少。《烦恼人生》中物的匮乏使得主人公印加厚无法选择、无法逃避只能被生活世俗化，让生活揉搓自己。在对生活的消极的顺从中，性格也受到消蚀和磨损，麻木僵化，人性发生畸变。《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在排队买豆腐、搬蜂窝煤、洗衣服、做饭、弄孩子的耗损中，在对付保姆、巴结人搞房子、求人让孩子入托、设法为老婆调工作的折腾中，丢失了他的事业理想、宏图大志，逐渐变得碌碌无为，一次次的受挫令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顺风使舵，最终对平庸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懒得离婚》中的刘述怀虽然对于家庭生活中潜伏着的婚姻危机不满，但却无力冲破世俗，只好维持现状，靠打牌消磨时日，“懒得离婚”形象地表现出他的疲惫心态和混世态度。在此，苦难如同一道道赤裸裸的风景，遍布于世界的中央。

我们对鲁迅笔下的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新时期当我们再一次遇到上面所述的这些小人物时，这种心情又流溢于心间。他们对于生活和苦难的态度与老中国儿女阿Q何等相似。一味忍耐的最终结果就是对苦难和现状的认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刺痛他们麻木的灵魂，人生只剩下了一个生存的理由，那就是活着，对于理想和未来的人生期盼从意识中消失。我们在惊讶这些人竟然具有如此超强的忍耐能力的同时也在痛苦地追问到底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这条万难忍受的逆来顺受之路。对此问题的探讨似乎应该回归到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朱光潜说：“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费力去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1]215中华民族注重的是外界和心灵的和谐，身陷困境时主张弱化矛盾，用生存的欲望来迁就生存的困境。所以许纪霖颇为无奈地说：“在充满乐感的中国文化中，一方面对世界的秩序和自身的命运从来没有彻底的理性怀疑，总是习惯于接受现实，顺从天命，另一方面，除了墨家有着‘摩顶放踵’的宗教精神外，其余各家学说都缺乏一种高扬意志，勇往直前的殉道气概。”[2]88因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天人合一”的标准下是“中和之美”和“团圆主义”。五四运动虽然试图彻底切断现代与传统的脐带，但有些传统因素早已作为集体潜意识沉淀于民族心理中。苦难在上面所论及的这些小人物看来似乎不是苦难而是生活的常态。看来，如何让他们超越苦难超越自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逃离：超然于宗教中

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面对苦难向宗教寻求解脱的路径。冰心、许地山、丰子恺等人的作品宗教文化色彩特别浓郁。冰心以基督教“爱的哲学”作为人生宗旨，丰子恺和许地山等更多地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他们在认同苦难、书写苦难的同时也积极探求摆脱苦难、超越苦难的人生之路。无疑，转向宗教也是实现苦难救赎的一条重要途径。

新时期作家中，汪曾祺对苦难的超然态度非常具有典型性。他曾多次表自己所追求的并非是一种深刻，而是和谐。《大淖记事》在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历经了生与死的考验，爱情更加坚定。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之后，苦难意蕴变得温婉素朴。在结尾处作者添进了希望：“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让人觉得苦难并不像噩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梦般可怕，而是如抒情诗般美丽。汪曾祺非常倾心于书写苦难中的超脱，“以一种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含泪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黯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觉得人生可爱。”[3] 他对于苦难的态度，染上了浓厚的道家文化色彩，体现了其对老庄“清虚”、“无为”、“独善”、“顺其自然”等范畴的认同。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面对苦难时也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王一生深得老庄精髓，从粗陋的食与棋，找到了实现肉体和精神满足的方法。他在“文革”年代于方寸棋盘之上寻找人生的乐趣，把吃饭变成了对食物的膜拜仪式。一颗米也不落地，餐具上的一星油花也要用水冲过喝下。他是不引人注意的“棋呆子”，但又是得“道”的“圣人”、“真人”、“神人”，用忘我最后达到了成就一个更大的自我。王一生在老庄哲学里寻到了超脱苦难的法宝，这与上述所论及的汪曾祺小说的文化主旨是一致的。

张炜《古船》深切地关注现代历史中的苦难生活，以“见素抱朴”抵御着物欲膨胀对人的异化。隋抱朴终日在磨房枯坐，一直在苦苦思索为什么人类历史要不断地重复相似的悲剧和闹剧。“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么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4] 小说以浓重的忏悔意识告诉我们，苦难是由于人自身种下了苦难的种子，苦难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中。支撑隋抱朴的，是儒家的救世、德性、和谐；道家的宽容、超越、和平；佛家的慈悲、渡人、舍身……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船》就是一个东方式的诺亚方舟。

张承志则满怀崇敬地走向了折合忍耶，力图以此来超越苦难构筑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他深切地注视着中国大地上贫困的苦难人民：热情豪爽乐观的牧民，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回民，衣衫褴褛的维吾尔流浪者……这些都使他相信“穷人是美丽的人”。整个《心灵史》都回荡着回族人民为捍卫民族信仰、坚守人生信念、不惜牺牲的执著与惨烈。在《心灵史》的全部写作过程中，张承志和他的读者们一道体验着贫穷、流血和死亡，也一道积蓄着征服苦难的毅力。七代导师为了信仰所承受的牺牲、杀戮和舍身一搏的反抗，令我们的心灵深深地为之震撼。张承志在对折合忍耶的追索中建构着苦难中的救赎之路。

苦难也是基督教教义要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形象成为基督教的基本象征。人类始祖的犯罪注定了他们的后辈子孙必然要重复他们的痛苦：分娩的阵痛，劳作的艰辛，死后复归尘土的恐惧和悲哀……一代一代，难有尽期。这可以说是《圣经》对苦难本体论意义的象征解释。怎样才能为沉沦的的灵魂寻找到一个得以安息的宁静的港湾？怎样才能使漂泊的痛苦的灵魂脱离苦海？在对终极意义的寻求和表达上，北村神性圣殿的构筑具有重要地位。在上帝福音的召唤下，《张生的婚姻》中的张生、《施洗的河》中的刘浪、《孙权的故事》中的孙权，最终都回归到主的怀抱，犹如迷途的羔羊。上帝洗去了他们的罪恶，抚慰着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由此他们重新获得了新生。在北村这里，痛苦和灾难成为他把人类灵魂的救赎重新导向上帝的理由。他在自己构筑的神性大厦里，把已经死去的上帝重新供奉在神圣的殿堂。在这里，我们感受到当代作家在加强和注重宗教精神方面所体现出的价值和分量。

宗教是在苦难中诞生的，苦难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同的宗教给出了解脱苦难的不同回答。所以当作家转向宗教寻求救赎之路时，这是作家自觉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单纯地投身于一种宗教作为终生的信仰，可能会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是，作家投身于何种宗教信奉何种信仰似乎并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建构一种宗教精神。上述所论及的作家作品不由不令我们相信，尽管中国自古以来都缺少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宗教信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宗教精神，关于这种宗教精神的主旨我在这里借用史铁生的一段话来说明：“看来苦难并不完全是坏东西。爱，不大可能在福乐的竞争中牢固，只可能在苦难的基础上生长。当然应该庆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幸那苦难时光的短暂,但是否可以使那苦难中的情怀长存呢?长久地听见那苦难(它确实没有走远),长久地听见那苦难中的情怀,长久地以此来维护激情也维护爱意,我自己以为这就是宗教精神的本意。宗教精神当然并不等于各类教会的主张,而是指无论多么第一和伟大的人都必有的苦难处境,和这处境中所必要的一种思索、感悟、救路。万千歧途,都是因为失去了神的引领。这里说的神,并非万能的施主,而是人的全部困苦与梦想、局限与无限的路途,以及零比九时的一如既往,和由其召唤回来的狂欢。"[5]

三、反抗:悲剧英雄出场

历史不过是生命留下的痕迹,而苦难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苦难中怀有对世界的真诚渴望,奋进到底,力图使生命永远洋溢激情,这就是悲剧的超越精神,也是悲剧之美。翻开历史,中华民族的确遭遇了不少苦难,流血、战争和死亡等等几乎让我们目不忍视,耳不忍闻。在难以计数的苦难之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人物,他们的坚强和不屈足以令天地动容,如屈子、孙膑、司马迁、苏武、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等。可以这样说,超越苦难使生命价值得以提升,苦难能够孕育出英雄。如何应对苦难,鲁迅先生的人文主张是一种近乎尼采式的超人哲学:"站在沙漠上,看飞砂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石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仿佛若有花纹。"[6] 鲁迅在对苦难的逼视和反抗中实现了人生飞扬的极致,他是令世界仰视的民族英雄。新时期小说里也涌现了众多英雄人物。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了陕北人民对待自然苦难和社会苦难的平静与从容,展示了他们承受苦难压力的坚强意志。当路遥把笔触从县城的学校转向农村时,有一段关于土地的描写:"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7]382路遥习惯于把土地与人生联系起来,在这片贫苦的黄土地上生活着千千万万坚强的人们。"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锨锨一镢镢地倒腾着山河!"[7]267书中人物之一孙少平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也是作家着墨较多、着重刻画的形象。小说描写了孙少平在自我放逐、精神流浪中企图找到人生的出路和价值。然而,在一系列执著的追寻中,为了生存的需要他首先要接受重重苦难的洗礼与考验。在苦难面前,这个小伙子没有退缩也没有屈服,而是坦然承受。同时通过对苦难生活的深度体验,他加深了对于人生的理解。正是因为孙少平这种对于苦难的自觉选择、主动地承受并在苦难中始终高举理想的旗帜,他的人生才富有崇高的意味与悲壮的豪情。孙少平是一个悲剧英雄。

莫言《红高粱》书写了"高密东北乡"人任情豪迈的壮丽生活图景。在这里,作者将匪气作为民间的英雄气概加以歌颂。"天生一个奇女子"和"天生一个伟丈夫"在火红的高粱地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虽有草莽和盗跖式的血腥,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则是生命的狂放不羁。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苍天:"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叫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域。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这是对于命运的不屈与无畏,对于死亡和苦难的蔑视。相比之下,父辈们为现实生活的艰难压迫得麻木不仁,震惊之下我们不禁怀疑起那可歌可泣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们,那惨烈悲壮、潇洒英勇、坦坦荡荡、与苦难作顽强地抗争的人们,是否真是我们这一代人或上一代人的祖先。

英国文论家斯马特曾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只是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对灾难的反抗，陷入悲剧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拚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总有一种反抗。”[1]206我们称呼后一种人为悲剧英雄。悲剧英雄决不会被苦难轻易地摧垮碾碎，他们亦不屑于那种超脱的情怀。他们大都有对终极价值的确信，对未来的企盼和憧憬。他们坚信人生必有某种值得为之受难的最高价值，为此他们不断地与迎面而来的各种苦难顽强地抗争。这种抗争不仅仅显示了一种个人品质，它还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并充分地证明这种尊严是最宝贵的，是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它剥夺的。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那个推巨石上山的英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成为我们世世代代顶礼膜拜的对象。

阎连科的中篇小说《年月日》是中国的《老人与海》，这已经为当今学界许多人所公认。海明威以蔚蓝的大海作背景，在其小说《老人与海》中直接宣扬了自己的人生观，即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倒。相比之下，《年月日》的主人公先爷不畏艰难困苦为全村人的未来播种看护玉米黍的果敢与决绝，历尽千难万险仍痴心不改的执著不悔，“饿死天，饿死地，还能饿死我先爷？”的乐观豪迈与坚贞不屈，让人不由不油然而生敬意。他的生存魅力在于生命力的无限张扬，他是黄色的中原农业文明中诞生的硬汉，是东方的西绪福斯和桑提亚哥。先爷凭着对土地的无限热爱和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以七十多岁的古稀之年独自留在正濒临百年不遇的大旱的耙耧山，培植保护唯一的希望——玉米黍。在经历了粮水皆尽、人鼠之战、与狼群对峙等数不清的苦难之后，先爷最后竟以自己的身躯作为玉米黍源源不绝的养料来源。玉米黍将根须深深地插进先爷的身体，终于成功地结出了七粒种子。先爷的故事像极了中国远古神话中见天崩地缺去昆仑采炼五彩石的女娲补天，走近太阳渴死在路上手杖化为桃林一片的夸父逐日，溺海而死化身为鸟日衔微木以填之的精卫填海，率子孙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的愚公移山，为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先爷是又一例炎黄子孙勇敢坚毅顽强不屈的明证。从某种程度上说，《年月日》是对失传已久的中国远古神话的悲剧精神的阐扬，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寓言。

四、结语

当然，上面所谈到的只是笔者认为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的救赎路径，并不能涵盖新时期小说中所有书写苦难的作家作品。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迟子建在她的小说中，描述了东北那片黑土地上人们的苦难生活。《亲亲土豆》、《秧歌》等一系列作品中主人公在经历了一桩桩的苦难之后又顽强地活下去，这也是一种忍耐，但却不是上文所提到的“为活着而活着”的无奈和苍凉，而是充满了温馨、舒缓和静谧。“一年一次的秧歌，年年都有盼头，日子才能过下去。”像“土豆”，丈夫死了和土豆在一起就安心了，女人认为土豆是不会骗人的，只要有土豆就能活命就能把女儿养大。迟子建创造了一个平和宁静的诗意环境，并为主人公和读者找到了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她书写苦难的生活的同时加进了女性作家特有的平和与温暖，使得我们在触摸苦难时没有感到压抑和沉重。可见这是不同于上述三种的另一种救赎之路。

苦难并没有远离我们反而就在我们身边。疾病、瘟疫、战争、地震、海啸、贫困等等都可以成为苦难之源。虽然对于个人和民族来说苦难是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成为文学的宝贵财富。将苦难写入文学作品是对于遗忘的一种拒绝，而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不被遗忘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和必要的前车之鉴。但是如果苦难真的降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又将选择何种方式实现苦难中的救赎？我们能否永远在绝望中怀有真诚的渴望？能否让理想的旗帜高高飘扬？能否在黯淡的世界里使生命永远富有激情？这是我们永远无法逃避的现实。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许纪霖. 读一读周作人罢[J]. 读书,1988,(3).
[3] 宗白华. 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76.
[4] 张 炜. 古船[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46.
[5] 史铁生. 史铁生散文(上)[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06.
[6] 鲁 迅. 鲁迅杂文全编(下)[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687.
[7] 路 遥. 路遥全集:平凡的世界[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The Kinds of Saving Routes about "Tribulation" of New Period's Novels

ZHANG J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ribulation is a perpetual theme of literature. Many writers wrote tribulation and saving routes in their works. There were mainly three kinds of saving routes about "tribulation" of new period's novels. They were tolerative manners living for living, running away to some religions to seek extrication and surmounting, and tragedy hero-like revoltion.

Key Words: new period; tribulation; saving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